




传神达意

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

付瑛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传 神 达 意

——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

付璞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神达意：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 /
付瑛瑛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06-14197-3

I. ①传… II. ①付… III. ①古籍-中国-英语-翻
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7123 号

传神达意——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

著 者：付瑛瑛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文 谦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制 版：吉林省长春市点石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长春市中海彩印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9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206-14197-3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师从汪榕培先生的付瑛瑛博士从江西寄来她的书稿，委托我为其作序，我欣然接受任务。原因有三：其一，此书专门为即将召开的汪榕培翻译思想学术研讨会而出版；其二，汪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其三，借机学习作者对“传神达意”全方位的解读和阐释。

汪先生与我是忘年之交，后来成为我走上典籍英译之路的学术导师，更是我从事民族典籍英译的启明星。

久闻汪先生大名。与先生谋面却是在 2001 年。那一年，我到大连参加了一个很奇特的会议。那个会议上名人众多，并且还是不同学科的，青年若我者并不多。会上有外语界名人，有汉语界名人，还有哲学界、数学界以及其他领域的名人。大家谈到，要打破学科壁垒，还要解决外语学者和中文学者很少往来的“两张皮”现象。现在想起来，这就是一次跨学科的研究会。我从此次会议受益颇多，眼界渐变宽阔。最大收获是：汪先生和张后尘教授等人委托我组织一次全国性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这就是 2002 年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参会人数并不多，不到 50 人，却都是名人：潘文国教授来了，张春柏教授来了，卓振英教授来了，蒋坚松教授来了，朱曼华教授来了，杨自俭教授来了，王宏印教授来了。还记得时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的杨自俭教授是坐长途公共汽车从青岛赶来的，好远好远的路，多么辛苦的旅途。还有很多人，篇幅所限，恕我不再一一追忆。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式纪念意义。自此，中国典籍英译的组织诞生了，成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这样一个全国一级学会的二级学会，即现在的“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此后，我还协助汪先生出版了第一本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未收分文出版费用。后来，会后出版论文集成为传统，每一届会议之后都出版一本全国会议论文集。到后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成为唯一出版全国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社。外研社还每次派专人参加会议。这一切都与汪先生的学术地位、高尚人品和英明领导密切

相关。

汪先生在典籍英译界颇受尊重。2011年大连大学召开汪榕培“传神达意”翻译思想研讨会。实际上，也是庆祝其70岁（虚岁）生日。我参加了。还作诗一首。今天附此，以回忆当年盛景并表示我对汪先生一生的简要总结和崇敬。拙诗如下：

大师颂

——贺汪榕培教授七十华诞

2011年6月25日

南生北战征西东，
才子七十今成翁。
传神达意携后辈，
典籍英译留伟名。

今年是汪先生75周岁生日。不巧的是，汪先生身体欠佳，仍在医院。因此，我心无绪，不想作诗，只想与大家一起以多种形式为他庆生。恰逢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在大连民族大学举办汪先生翻译思想学术研讨会。由汪先生创办的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自然要申请联合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我和会长王宏印教授商议后通过王维波教授表达意愿并获得批准。王维波教授积极组织多种期刊发表相关文章，奖掖后辈出版专著以示全方位庆祝，这肯定会使这次研讨会成为研讨内容集中、学术水平高、期刊参与多、参会者热情高涨、对前辈学者充满崇敬的盛会。

汪先生退休前一直从事英国文学和词汇学等课程教学。退休后才真正开始典籍英译工作，并且到苏州大学等高校做博士生导师，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典籍英译人才。汪先生超越世俗，不计名利，玩味翻译，以此为乐，硕果累累，进入“大中华文库”的就有8本之多。他还带着弟子们进行各种典籍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如今他的弟子们都已在全国各地成为典籍英译实践与研究的栋梁之才。付瑛瑛博士是其中之一。

付瑛瑛继承了汪先生“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将汪先生翻译思想理论化。这是此书的重大贡献。她在书中说：“传神达意”并非简单的四个字，而是富有

丰富的内涵。汪先生为何要以“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为指导，想用此去表达什么，说明什么，如果我们能找出这种思想背后的规律，则有很大的价值。

目前，在古典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英译研究方面，研究文章多集中在语言的对比分析层面。付瑛瑛另辟蹊径，在本书中带我们走出了语言分析的圈子，从本土出发寻找发展的资源并进入了古典画论、古典文论的领域，以古论今，古为今用。不仅如此，她还拟将其构建成适用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可谓是大大的创新！这种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者融合了西方的理性思维与中国的诗性思维，借鉴“中观理论”、“原则—参数”和“最简方案”，对“传神达意”进行理论定位与探索，使中国特有的诗性思维模式顺着西方已有的模式进一步深入，在诗性的基础上带有理性化。

第二，作者指出，“传神”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可以具体细化的。作者将“传神”追溯至中国古典画论，并就其在古典文论的发展进行了探讨，最终明确翻译中的“传神”是什么。

第三，“传神达意”可以作为典籍英译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具备理论上的指导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操作性，是行之有效的一套原则和参数。这个总原则下归纳出的参数呈现出“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特点。

第四，用“同心圆”来表示“传神达意”的偏正关系颇具新意。这种广泛而又开放的特点可容纳“原则”范围内更多“合理”的参数，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本书以“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来建构“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虽然是尝试性的，但作者提出了一些新鲜有益的观点，具有开拓性，对今后的典籍翻译理论体系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典籍翻译尤其要注重文学性，提高可读性，不斤斤计较一字一句的真实，要“传神地达意”，做到神形兼备。经过研究的“传神达意”再返回实践是认识层面的升华，可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是为序！

李正栓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于河北师范大学

2017年7月

前 言

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首次译介《明心宝鉴》，标志着中国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正式步入历史舞台。之后的四百余年，中国典籍英译经历了最初的由外国传教士译介到中外合译再到现在中国人自己进行翻译的过程。西方不乏优秀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典籍抱有极大的热情，从第一批最优秀的汉学家理雅各、德庇时、翟理思到第二代汉学家韦利再到第三代汉学家霍克斯、白之，对中国典籍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从未间断过。中国从事典籍英译的人，在晚清民初时有辜鸿铭、苏曼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人英译中国典籍的数量不多，比较突出的是林语堂；1979年以来，中国典籍翻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典籍作品被翻译出版。目前，中西两支队伍同时对中国典籍作品进行译介与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以往相比均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一方面，中国典籍目前译介的数量与浩瀚的文化典籍作品的数量相比仍然微乎其微，翻译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另一方面，我国典籍英译事业在翻译实践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并未及时在翻译理论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可以说理论落后于实践。

张柏然教授和许钧教授在“典籍英译：立足本土 融合中西”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时，均以本土翻译现象和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例证材料，这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的最珍贵资源。中国的文化材料和文学现象是典籍翻译理论建设的依托”。汪榕培教授提出的“传神达意”翻译思想，正是其在多年的典籍英译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汪榕培教授自1990年首译《道德经》以来，便对翻译典籍作品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他在1994年对《诗经》进行全文英译后明确提出了“传神达意”这一翻译思想。对于“传神达意”的内涵，汪榕培教授曾多次撰文进行论述，可见，“传神达意”是他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的切身体会，有不吐不快之感。在其后的翻译生涯中，其一以贯之坚持这一翻译思想，在《牡

丹亭》和《墨子》的译序中更是明确指出“为自己的译文制定了‘传神达意’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汪榕培教授共有8本译著进入“大中华文库”，成为“大中华文库”系列译著中最多产的一位译者。可见，“传神达意”作为一种翻译思想，诞生于典籍英译实践，又对汪榕培教授本人翻译中国典籍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指引作用，作者认为对“传神达意”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文论、译论的脉络，对建构明晰的典籍英译理论框架有积极意义。

然而，何为“传神达意”？这个翻译思想在提出之初，尚处于感性阶段，还不够精确与完善，我们也不能全面地知道它的具体细节。本书旨在通过深入的研究尝试将“传神达意”建构成一个适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赋予这个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以有形形式，使其重要参数得以固定，以期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研究中，作者秉持“中西融通”的理念，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观理论”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原则—参数”模式对“传神达意”的内涵进行探讨。“中观理论”主要用于对“传神达意”进行理论定位，指出“传神达意”既具备理论的指导性又兼备实践的操作性。“原则—参数”模式主要用于确定“传神达意”的原则和参数，即“达意”和“传神”作为典籍英译的两项基本原则；“达意”的参数设定为“语义层面”、“语用层面”和“认知层面”，“传神”的参数设定为“文体”、“风格”、“意境”、“情感”和“形式”。这里总结出来的“传神达意”的参数其实是中西方所共有的，是译者在翻译时必然涉及到的，只不过缺失了系统归纳这一环节，作者尝试把翻译中涉及到的参数都归到“传神达意”这个总原则、总标题之下。简言之，本书借鉴了西方的理性思维对具有诗性思维的“传神达意”进行了深入研究，尝试建构了“感性、知性、诗性、理性”并存的典籍翻译体系。

本书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这部分主要论说本研究的缘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文章结构。第二章讨论了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几步准备工作。本章先是对“思想”、“理论”、“理论体系”等几个高频使用的术语进行界定，接着分析将“传神达意”建构成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在综合国内学者对建构理论体系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本书对于建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设想。第三章对“传神达意”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详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它们的内涵及要点。第四章探讨了“传神达意”与“中观理论”、“原则—参数”的融合。第五章讨论了“传神达

意”在典籍英译实践中的应用。作者从古典诗歌、古典散文、古典戏剧、古典小说中选取个案进行比读。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本章首先对前五章进行小结，进而指出本研究的贡献、研究的局限性及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本书所做理论体系的建构只是尝试性的，合理科学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建构任重而道远。但，作者坚信只要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借鉴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与时俱进，从典籍英译实践中来，再回归到典籍英译实践中去，科学合理的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构建一定会对翻译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1 概述	1
1.2 研究目的	2
1.3 研究方法	4
1.4 研究意义	9
1.4.1 理论意义	9
1.4.2 实践意义	13
1.4.3 方法论意义	15
1.5 本书结构	19

第二章 建构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准备

2.1 概述	22
2.2 相关术语界定	22
2.2.1 思想	22
2.2.2 理论	25
2.2.3 理论体系	28
2.3 建构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3
2.3.1 “典籍英译”范围及概念的界定	33
2.3.2 中国典籍英译发展及现状概述	37
2.3.3 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41
2.3.4 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建构的可行性	49
2.4 建构理论体系应有的思维方式：融合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56

《《 传神达意——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 》

2.4.1 思维是什么?	56
2.4.2 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59
2.4.3 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特点及其表现	63
2.4.4 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	69
2.4.5 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在典籍英译中的应用	72
2.5 国内学者对建构翻译理论体系的看法	77
2.6 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建构的设想	82
2.7 本章小结	86

第三章 “传神达意” 的内涵探究

3.1 概述	88
3.2 “传神达意” 的客观因素	90
3.2.1 “达意” 的客观因素	90
3.2.2 “传神” 的客观因素	93
3.3 “传神达意” 的主观因素	113
3.3.1 守其神, 专其一的老庄思想	114
3.3.2 崇尚简约自然	119
3.3.3 翻译与研究并重	122
3.3.4 迁想妙得与临见妙裁	129
3.3.5 真枪实刀的苦译精神与饱满的翻译热情	131
3.4 “传神达意” 的内涵及其要点	135
3.4.1 “达意” 的内涵及其要点	135
3.4.2 “传神” 的内涵及其要点	155
3.4.3 “传神达意” 的整体性	165
3.5 本章小结	168

第四章 “传神达意” 与 “中观理论”、 “原则—参数” 的契合

4.1 概述	170
4.2 默顿 “中观理论” 的内涵和特点及其与 “传神达意” 的契合点 ...	172
4.2.1 “中观理论” 的内涵及特点	172

4.2.2 “中观理论”与“传神达意”的契合点	178
4.3 乔姆斯基的“原则—参数”模式和“最简方案” 及其与“传神达意”的契合点	181
4.3.1 “原则—参数”和“最简方案”的内涵及特点	181
4.3.2 “原则—参数”模式、“最简方案”与 “传神达意”的契合点	185
4.4 “传神达意”与其它译论的比较：异中求同，同中求异	189
4.5 本章小结	197
第五章 “传神达意”在中国典籍英译实践中的应用	
5.1 概述	199
5.2 译文的可比性原则及本文译文比读方法说明	200
5.3 “传神达意”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应用	206
5.3.1 《诗经》	207
5.3.2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	230
5.3.3 《陶渊明集》	241
5.4 “传神达意”在中国古典散文翻译中的应用	255
5.4.1 《庄子》	256
5.4.2 “石钟山记”	272
5.5 “传神达意”在中国古典戏剧翻译中的应用	285
5.5.1 《牡丹亭》	286
5.5.2 《思凡》	300
5.6 “传神达意”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中的应用	311
5.7 本章小结	314
第六章 结论	
6.1 小结	316
6.2 研究的贡献	319
6.3 研究的局限	321
6.4 可拓展的研究空间	322

《《 传神达意——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 》

附录一：汪榕培教授简介	326
附录二：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328
附录三：汪榕培教授译著作一览表（1982—2017）	335
参考文献	342
后记	366

第一章 导 论

1.1 概述

任何理论都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它的形成需要有丰富的实践作为基石。“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是汪榕培教授在长期丰富的典籍英译实践中对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早在 1994 年，汪榕培教授英译《诗经》时就提出了“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在之后十余年的典籍英译活动中，他一直遵循着“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奉行翻译与研究并重的原则，以他那饱满的翻译热情和真刀实枪的苦译精神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着典籍英译这项高投入、低产出的翻译活动，到目前为止，他已有 8 部译著进入《大中华文库》，成为《大中华文库》中译著最多的一位译者。他的译著受到业内人士的赞誉和认可，这足以表明以“传神达意”为标准的典籍英译思想是切实可行的，它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升华。

对于我国典籍英译的现状，汪榕培教授有过这样的描述：自 1590 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首次译介《明心宝鉴》以来，中国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正式步入历史舞台。从国外情况来看，西方不乏优秀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典籍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从没间断过。从第一批最优秀的汉学家理雅各、德庇时、翟理思到第二代汉学家韦利再到第三代汉学家霍克斯、白之，他们都对中国典籍抱有极大的热情，在翻译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譬如说，理雅各在完成《四书》、《五经》翻译的同时还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白之翻译的《牡丹亭》历时七八年完成，他参考了各种文献资料，数易其稿，减少了可能的失误。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从事典籍英译的人也很多，在晚清民初时有辜鸿铭、苏曼殊；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国人英译中国典籍的数量不多，比较突出的是林语堂；1979 年以来，中国典籍翻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大量的典籍作品被翻译出版，这种大好的形势成就了一些优秀的翻译家，其中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许渊冲等人对典籍作品的英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典籍英译经历了最初的由外国传教士译介到中外合译再到现在中国人自己进行翻译的过程。目前中西两支队伍都在进行着中国典籍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然而，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相当有限。大量外国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而中华文明史上的不少精华内容还没有被译介到国外，连《史记》、《资治通鉴》都还没有全译本，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确实如汪榕培教授所言，中国典籍目前译介的数量与浩瀚的文化典籍作品的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翻译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事实证明，我国典籍英译事业在翻译实践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显著成就，但这种成就并没有及时地在翻译理论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可以说理论落后于实践。如果将来要对《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进行翻译，必是需要很多译者共同参与，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制定一套相对统一的翻译标准，因而对“传神达意”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般来说，思想先行，方法开路，乃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共通之理，建构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当然也不例外。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曾经说过，“知识产生预见，预见产生行动”（转引自王荫庭，1988：309）。本章作为导读部分，拟分别对研究目的、研究意义、文章结构等内容作提纲挈领性的叙述说明。

1.2 研究目的

2009年2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汪榕培教授和王宏教授主编的《中国典籍英译》一书，该书是供翻译专业本科生使用的教材，是对典籍英译研究与教学的一大突破性尝试。书中再次强调了汪教授于1994年在英译《诗经》时提出的“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思想，并以此作为中国典籍英译总的指导原则。“传神达意”可以说是汪教授翻译思想的精髓，是他在几十年如一日丰富的典籍英译实践之余对翻译理论进行理性思考的产物。翻译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刘宓庆（2005：2）曾把翻译思想视为翻译理论的最高层级，认为翻译思想是“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经验的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

知，这种认知又反过来指导他在更高层级上的实践，由此获得新的经验，从此周而复始”，他还认为翻译思想是翻译家和理论家高度富集的对翻译行为的经验观察，是对翻译的切身领悟，具有高屋建瓴的洞见性质，是一种既“见树”又“见林”的高视角、整体性透视（同上，2005：3-5）。纵观自古以来的翻译理论，哪一个不是翻译家思想的精髓呢？陈福康（2000：527）在谈及这些散论时说：“这些译论，从个别论者来看，好像是随感而发，经验之谈，不成体系，但从整个译论发展或全部资料来看，却是彼此贯通，共成体系的。虽然前辈们有很多译论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但它们已形成命题，为我们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以近代翻译大师严复为例，他提出的“信、达、雅”经久不衰，被后世者广泛研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这样的研究其实就是对翻译思想的研究。“一般来说，翻译思想之是否活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翻译事业（包括翻译理论研究）之是否在蓬勃向前发展”，但“中国译界对翻译思想的探讨不够，大抵属于认识问题”（刘宓庆，2005：15-16）。

由此可见，对翻译这门学科而言，研究译者翻译思想的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势在必行。思想与认知主体存在密切的关系，它必须通过主体的主观认知才能被反映和提示。正如爱尔兰作家萧伯纳（George Shaw Bernard）所说：“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如果我们双方交换，你和我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作者从中深受启发，便萌发了对汪榕培教授的翻译思想“传神达意”进行研究的念头。“传神达意”作为一种翻译思想，是汪榕培教授对中国典籍英译一种规律性的把握，是在理解、识别、筛选中确立起来的，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传神达意”在提出之初，尚处于感性阶段，还不够精确与完善，我们也不能周全地知道它的具体细节。基于以上的考虑，作者对“传神达意”这一翻译思想抱以极大的兴趣，旨在通过深入的研究赋予这个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以形式，使其得以固定传达给广大读者。作者在对“传神达意”的思想内涵进行分析时，注意到这一翻译思想有深厚的主客观渊源。在获得这点认识之后，作者就能否把“传神达意”建构成一个适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细致的思考，包括建构的可行性、必要性，建构的步骤，建构的方法，建构后如何检验等一系列问题。从准备工作上来看，本书虽是对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但并非是随意盲目的，而是经过缜密思索的。

对于译者思想、译本比读等方面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王佐良于1987年在一篇题为“新时期的翻译观”中就曾指出，“诗歌翻译研究论文不少，但似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也不能只停顿在若干字句的对比，而要引出几条重要结论”（王佐良，1989c：6）。虽然学术界一直倡导要建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但关注的力度尚嫌不够，目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仅仅是提出来了，仍旧需要解决。就中国典籍英译目前发展的趋势而言，建构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显得尤为紧迫。

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对“传神达意”的主客观因素进行详尽探索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传神达意”的内涵及要点，再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确定“传神达意”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最后将其置于译文比读中以接受实践的检验，将其建构成一个适用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赋予这种有价值的翻译思想以固定的形式，并被读者广泛接受，以便更好地指导将来的典籍英译实践。对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尝试性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猜测，西方科学巨匠牛顿就说过，“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对于建构后的理论体系是否合理，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我们不能孤立地说它合理与否，必须仔细审查它的认知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即客观分析与主观意愿是否相一致。

1.3 研究方法

方法论的使用在人文学科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先以语言学为例，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哲学等等，都是由方法论的探索而演绎出来的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这些学科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索语言学的方方面面，相互借鉴、相为补充，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最后构成语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译研究亦如是。譬如：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翻译、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翻译、从哲学角度探讨翻译、从女性主义角度探索翻译，这些林林总总的角度就是方法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2007年由英国研究者皮奥特·库希威扎克（Piotr Kuhiwczak）和卡林·利陶（Karin Littau）合编的论文集《翻译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无论贡献多与少，可以说，对翻译研究都有贡献，能给我们以启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由于性质和研究对象的不同，